

世界比较教育 200 年回眸与前瞻

□ 胡 瑞 刘宝存

北京师范大学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北京 100875

1817年,法国教育家朱利安发表了《比较教育的研究计划和初步意见》,赋予了比较教育的合法性与学科身份的独立性。著名的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将科学发展进程确定为“前科学”“常规科学”“科学革命”和“新常规科学”四个阶段,且每个阶段包含了学科范式的不同发展特点。库恩的范式理论为我们审视比较教育学科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本文参照库恩的范式理论,以“前科学”阶段为逻辑起点探索比较教育的发展历程,不仅回顾了“常规科学”阶段、“科学革命”阶段的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等关键性问题,而且分析了比较教育在目前所处的“科学革命”阶段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和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展望未来比较教育学科的发展趋势。

一、确立“前科学”阶段的比较教育发展

依据库恩的范式理论,比较教育自1817年到1900年的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前科学”阶段。“前科学”阶段恰逢欧洲民族国家工业的良性发展时期,各国为了本国的繁荣逐步重视发展教育、提高国民素质以及培养人才。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以朱利安为代表的早期比较教育学者,开始研究别国教育,借鉴别国经验。比较教育自独立身份确立以来,借鉴别国的经验就成为主要的研究目的,“前科学”阶段这一特点体现得尤为突出。这一时期,以经验主义为基础的实证思想在法国思想界占据了主导地位,认为一切知识都是以经验的实证材料为依据。“前科学”阶段比较教育的方法论具有浓重的历史和哲学倾向,强调描述、比较和借鉴。朱利安认为借鉴别国经验是比较教育的重要切入点,对于不同国家的教育经验加以总结和具体分析是比较教育研究的重要方法。解释学理论所提倡的描述与释疑活动,与这一时期比较教育研究的目的及功能相吻合,这奠定了比较教育学科发展的基础。尽管如此,比较教育的“前科学”阶段仍处于一个“无范式”的发

展时期,缺乏系统的理论支撑体系和方法论指导。正如著名哲学家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提到的“一切的开端总归是粗糙的”,比较教育亦经历了“粗糙”的早期发展阶段,然而,“无范式”的“前科学”阶段无疑为比较教育进入“常规科学”阶段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常规科学”阶段的比较教育发展: 建立了相对稳定的研究范式

20世纪以来,资本的全球扩张在客观上推动了国家间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与此同时,美、苏两大阵营的形成、冷战的开始,尤其是被殖民国家的独立和民族国家的建立,促使比较教育学者的眼光转向了这些民族独立的国家。这一时期,比较教育在理论依循、话语体系上出现了分化,“历史主义”“民族主义”“因素分析法”成为推动学科发展的重要理论来源,比较教育学科逐步从“前科学”阶段进入“常规科学”的初步发展阶段。此后,“结构功能主义”“实证主义”等理论被广泛用于对教育问题与现象的释疑方面,从而丰富了比较教育研究领域的理论体系。

(一)比较教育“常规科学”的初步发展阶段。1900年,英国学者迈克尔·萨德勒发表了《我们从对别国教育制度的研究中究竟能学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的演讲,标志着“因素分析时代”的到来,他反对片面、孤立地看待教育问题,提倡将特定时期的教育现象纳入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当中,探索民族性和国民生活中各种因素对教育制度的影响,认为比较教育不能指望把别国的教育简单地分割开来,并从中抽取某一部分来运用于本国教育。与萨德勒的比较教育思想一脉相承,美国比较教育学家艾萨克·康德尔认为“除非比较教育寻求发现作为教育制度基础的民族主义的意义,否则就毫无价值”,因为教育制度是为了保持、维护和促进民族主义的目的而组织起来的。“历史主义”和“民族性”能够成

为主要理论流派的原因是人们逐渐认识到教育是植根于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制度之中的,不了解教育的历史文化基础和决定教育制度的各种因素,教育经验的借鉴就成为奢谈。在这一时代背景下,萨德勒和康德尔的比较教育思想均具有鲜明的历史主义倾向,他们认为比较教育是教育史研究自源头至今不断延续的产物,比较教育研究必须立足特定民族或国家的历史。继萨德勒和康德尔之后,英国比较教育学家汉斯和德国比较教育学家施耐德对因素分析法进行了更为细致的研究。至此,以分析为主要特征的比较教育进入了“常规科学”的初步发展阶段。

(二) 比较教育“常规科学”的成熟发展阶段。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比较教育处于学科发展历程中最活跃的时期,“实证主义”“结构功能主义”等理论的引入推动了比较教育在方法论、理论体系和研究领域等方面的新拓展,比较教育逐步进入“常规科学”的成熟发展阶段,其标志为:一是比较教育研究领域的持续拓展。“常规科学”阶段的比较教育,在研究内容上不再局限于传统国别和区域教育问题研究,全球化及全球化理论、跨境教育、教育合作等问题已经进入比较教育的研究范畴。这种变化一方面展示了这一时期全球范围内比较教育学科发展的新动态及新领域,另一方面也展示了比较教育研究的宽广视野和国际意识。二是比较教育研究方法的科学化与程序化。美国教育学家贝雷迪认为比较教育应倡导实用性理念,他将教育比作一面镜子,从中折射出特定文化环境中的民族性,并认为比较教育的价值在于通过分析其他民族而更好地通晓自身,并推动国际理解。在研究方法上,贝雷迪提倡大量吸收社会科学的方法,包括哲学、经济、历史、社会学等领域的方法用以开拓比较教育的研究领地。三是“实证科学”为比较教育研究注入活力。作为比较教育领域知名的学术搭档,诺亚和埃克斯坦于1969年出版了《迈向比较教育科学》,该书超越传统比较教育研究方法中“历史”与“哲学”的态度,提出比较教育是“完全的实证科学”,同时将定量研究思路引入到比较教育研究,提出了比较教育研究程序、方法应符合社会科学的特定规范,为研究结论提供客观、科学化依据。同样以假设为中心,英国著名比较教育学家霍尔姆斯的“问题法”提倡多重方法的综合,用以解决教育领域当前最突出且具有全球共性的问题,在方法论体系上丰富了诺亚和埃克斯坦的以“证实”为基础的实证方法体系,增加了比较教育科学化的内涵,推动了实证方法成为比较教育研究的主流。四是比较教育理论体系走向多元化。随着比较教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结构功能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系统学理论、文化再生产理论、反全球化理论、

交互作用理论、冲突理论、批判理论、女性主义以及以埃德蒙·金为代表的文化相对论分析模式逐步进入比较教育研究体系,进一步打破了“前科学”时期解释学范式占主导的局面。“常规科学”时期,比较教育科学体系的完善、研究水平的提升以及人才培养的卓著成绩逐步消解了外界对比较教育“身份危机”的担忧,培植了学科发展的内生性动力。

三、“科学革命”阶段的比较教育发展: 范式动摇、面临新挑战

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2000年之后,新的变化使得正在经历常规化、快速发展的比较教育在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及研究目的等方面遭遇挑战,20世纪以来逐渐形成的研究范式开始动摇,比较教育逐步进入了“科学革命”阶段。

第一,全球化改变比较教育的研究边界。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诸多全球性教育问题逐步凸显,通过改善教育来解决全球性教育问题成为重要出路,因此,教育政策及其实施路径的研究成为重要的研究领域。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教育问题联系紧密,甚至存在深度依赖关系,这就要求比较教育研究者转变研究单元、扩大研究视野。

第二,大数据时代推动比较教育研究方法的变革。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大数据时代,国家重大决策都以大数据作为依托,比较教育研究也将面临掌握和运用大数据的挑战。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促进了比较教育研究空间的持续扩张,跨国、跨地区的学业测评在这场变革中发挥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例如,国际教育成就评价协会推动的国际教育成绩评价、OECD开展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试”等,无不引发了大数据、探索性的比较教育研究及方法论体系的革新。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不仅仅拓展了比较教育的研究内容,建立了具体研究问题的标准,而且推动了比较教育的研究方法从描述到统计、再到大样本分析的转变。

第三,“实证主义”的局限性警醒着比较教育研究者。实证研究方法进入比较教育研究领域无疑增加了方法的科学性及其选择的多样性。然而,由于教育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实证研究取向偏好的定量方法只适用于比较教育的某些方面,而对其他一些教育现象进行比较研究则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在比较研究中,定量方法虽然对于呈现、描述、分类乃至预测教育现象是有用的,但是并不能提供真正的因果关系,因为统计上的“解释”总是有限的,它对复杂的社会因素进行了过于简化的处理。实际上,统计更多从“证伪”的角度解释现象背后的规律,统计模型表述的变量之间的关系即使很好地拟合了数据,也不能完全证实这一关系的实际存在。

因此,实证研究方法的解释力在一定程度上遭遇质疑,如何把握实证研究方法的使用边界和限度也成为比较教育研究者必须面对的问题。

第四,比较教育研究尚未充分切合国家发展的新需求。比较教育曾被喻为“政策的助手”,这反映了以借鉴为主要目的的比较教育具有服务全球战略、促进国别及区域教育改革的实用性价值。然而,比较教育研究的结论及其应用尚未满足国家发展的现实需求。例如,如何从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推动跨国、跨区域、跨文化的教育问题研究?如何在新的世界格局、区域教育利益及国家宏观战略下体现比较教育研究的价值?如何推进比较教育研究内容、方法及范式的革新,从而服务于全球教育改革及实践等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聚焦于我国当下,“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设等一系列国家发展战略相继出台,而在这些重大战略举措中,“比较教育何为?”等问题已经摆在比较教育研究者面前。

四、“新常态科学”阶段比较教育发展: 走向新的研究范式

虽然我们不能说比较教育的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科学”阶段,但是,我们可以预见“新常态科学”阶段即将到来,在新的研究范式孕育阶段比较教育将会呈现以下几个主要特征。

第一,持续关注“国际教育”和“发展教育”研究。比较教育存在于全球—本土辩证关系之中,比较教育推崇的经验借鉴也是基于彼此语境的总结。正如美国学者斯塔奈哈姆泽所指出的,政策借鉴是一个复杂问题,在考虑任何政策借鉴的时候,语境都必须是优先考虑的问题。“国际教育”和“发展教育”正是全球化背景下基于语境差异形成的比较教育研究领域。未来国际教育研究的重点领域至少应包含四个方面:一是关于国际组织、机构的教育政策研究;二是新形势下全球性教育问题的现状以及发展走向研究;三是多元文化交互背景下的跨国、跨境教育问题研究;四是国别及区域的教育合作与交流,例如,面向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援助方式及其有效性等。发展教育通常以发达国家或地区为参照,围绕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实践及问题提出改进方案。发展教育既可以被视作具有独立边界的研究范畴,也可以作为国际教育的组成部分,未来研究应关注如下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国际教育援助研究;二是加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教育研究。

第二,多元化研究方法的综合与平衡。比较教育研究方法将会迎来以下方面的变革:一是注重多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比较教育领域的综合运用。比较教育的方法论体系当中,应包括比较方法、哲学

方法、政治学方法、经济学方法、社会学方法等,以满足比较教育对于不同地域和不同时期教育现象研究的需求;二是探索定量研究方法在比较教育研究过程中的科学化操作过程。新的学科发展阶段,定量研究方法应追求更加规范、科学化和可操作化的发展目标。同时,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应基于研究对象属性及问题特性展开,避免将社会科学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对立,或者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视为非此即彼的方法选择;三是促进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与定量研究方法的有机结合。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探索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教育现象及其意义解释上,有利于为不同国家教育现象及过程提出鲜活而细致的分析。然而,定量研究方法在学业测评、教育效果评估以及寻求不同教育结果的诱因及影响过程等方面具有优越性。因此,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与定量研究方法的平衡与共生将成为未来比较教育的方法论发展趋势。

第三,符合时代特征的新研究范式日益崛起。在新的发展时期,比较教育的研究范式将会充分体现出自身的时代性,具体来说:一是把握大数据时代契机,推动研究范式的转型与适应。大数据时代,教育研究样本在选取上更加广泛、数量上更加庞大、效率上的优势也更加突出,亟须探索更具针对性的理论分析框架和实践操作过程,这要求比较教育研究者掌握大数据研究方法及其运用;二是探索比较教育的文化范式研究。全球化背景下,比较教育学学者应力求从不同教育形态的文化根源入手,重点关注中外教育实践过程中产生的实际问题和前沿问题,探索教育研究规律、揭示文化归因;三是在冲突的范式体系中寻找增长点。尽管不同的研究范式提供的分析框架不具备完全的内部一致性,但不同范式之间并没有绝对的边界,而是存在对立与统一的关系。因此,研究者不仅可以选取一致性较高的分析范式,还可以采用不同的研究范式,甚至是存在矛盾性的分析框架,寻求独特的研究范式和科学的研究结论,增强比较教育研究的理论洞察力。

第四,满足国家及区域宏观发展战略需求。康德曾鲜明地指出,“除非比较教育研究能够致力于发现国家主义的意义,否则它是没有价值的,因为国家建立了教育制度的基础”。比较教育研究需要紧密围绕国家发展需求,重视比较教育对当下教育改革实践的作用,提升比较教育研究的学理性层次及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现实作用,不断促进比较教育走出经验性研究,通过科学方法和理性辩证研究赋予比较教育研究更为深刻的研究价值,在不断完善自身学科建设的同时,力求与国家发展战略紧密结合。

■ 《比较教育研究》2018年第7期,约15000字